第一章　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前关内东北救亡团体的演变

（1931 年 9 月～1937 年 6 月）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制造了它蓄谋已久的侵略我国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大多不战而退，致使日军仅用了 4 个多月的时间就吞并了相当于其本国国土总面积 3 倍的我国东北三省。从此，三千万东北同胞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几十万人被迫远走他乡，流浪到关内或其他地方。

地处我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不仅拥有广阔而富饶的大地，并且是我国的边陲重地和战略要冲，很早就引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垂涎，特别是沙皇俄国和日本更把它作为侵略的重要目标和相互角逐的场所。早在 1858 年至 1860 年间，沙俄政府就先后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日本自 1868 年明治维新后，确定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扩张国策，[1]把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1895 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获胜，强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和辽东半岛。虽然由此激化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矛盾，引发了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德、法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但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的角逐愈演愈烈。1904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在战争中大败沙俄，夺得了其在旅顺、大连的租界及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起至大连一段的南满铁路。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先后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三个侵略机构，在东北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

1914年8月，日本借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济南、青岛和胶州湾，取代了德国在我国山东的侵略地位。

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之后，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政府蛮横地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迫使袁世凯政府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从而取得了在东北修建铁路、开设厂矿等一系列侵略特权。

1917年段祺瑞上台后，日本政府继续推行侵华政策，狂妄地宣称：“满蒙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应在长城以南”，“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应“立即开发满蒙”。[2]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的“东方会议”制定的《对华政策纲要》，赤裸裸地提出：“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应对其“作特殊的考虑”。当日本“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都应“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

适当的措施’。[3] “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将会议决策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于 1927 年 7 月 25 日上奏日本天皇，此即后来被称为《田中奏折》的秘密文件。此件狂妄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田中奏折》中还详细地策划了日本占领满蒙的步骤。

1929 年底，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着日本。为了摆脱国内危机与矛盾，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从 1930 年初到 1931 年 7 月，日本派出大批军事人员在东北各地实施军事侦察与实地训练。从 1930 年 10 月到 1931 年 7 月，在东北日军共演习 50 余次，参加人数 7000 余人。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吞并我国东北的年代，东北地区正处在张作霖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

绿林出身的张作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为“东北王”,并进而于 1924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掌握了北京政权的。但是，以吞并东北为国策的日本帝国主义与张作霖的统治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当 1928 年 6 月张作霖被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打败，被迫离京退守东北时，日本帝国主义于 6 月 4 日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张作霖负重伤当天死去。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引起东北混乱，然后以“维持治安”为名占领东北要地。但是，张学良子承父业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稳定了东北政局,并于 1928 年 12 月 29 日通电全国：“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

政府,改旗易帜”。

张学良东北易帜使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东北，但国内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9月，张学良率兵10万进驻平津，拥护蒋介石国民党政权，致使蒋战胜了冯、阎，张本人也于10月被蒋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1931年4月，张在北平设置了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行营，坐镇北平。“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东北军有14万精锐部队驻扎关内，只有不足13万人的部队驻在关外，加之在事变爆发时又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致使东三省在数月之间便沦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抗日救亡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救亡运动有如浪潮般地涌动着。在这声势浩大的救亡浪潮中，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站到了斗争的最前线。他们的反日斗争基本形成为两条各具特色的主线：一条是在东北沦陷区内采取军事打击为主的武装斗争。它经历了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东北抗日联军[4]两个阶段；一条是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组织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这主要有“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吉黑民众后援会”、“复东会”和“东北旅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影响面有大有小，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也深浅不同，但它们都是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都对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同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组织、领导的作用，对东北沦陷区内的武装反日斗争也给予过积极支持，为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打下了

基础。

一、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1931 年 9 月～1933 年 7 月）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最早建立的抗日救亡团体。1931 年 9 月 27 日它成立于北平，1933 年 7 月被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强令停止公开活动。由于它抗日救亡旗帜鲜明，宣传鼓动形式多样，武装斗争有声有色，所以它虽然存在不足两年，却对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坚持战斗，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辽宁省各法团和反日团体领导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5]等相继逃亡北平。他们与在北平的王卓然、王化一[6]等联合各界东北人士和青年学生，在张学良的暗中支持下，于 1931 年 9 月 27 日，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街 12 号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是蒋介石不抵抗命令的执行者，[7]但是张学良国难家仇系于一身，他执行不抵抗命令也很矛盾。他很清楚东北沦陷无疑使他与东北军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地。他在召见东北籍旅平青年学生代表时曾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8]他也曾以自责的心情对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说过：“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我是一个民族罪人，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有何面目再见东北父老。[9]张学良这种既不能违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又不甘心丢掉东北的矛盾心理，是他在“九一八”事变后暗中支持东北人民和爱国官兵进行抗日复土斗争的内在原因。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由卢广绩主持。与会者400多人，多为东北籍。大会经热烈讨论，通过了以下几项主要决定：

1. 本会宗旨：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

2. 入会条件：不限东北籍人员，凡有国家观念，主张以武力抵抗日军之人员，皆可入会。

3. 主要任务：聘请军事人才，组成特别委员会；发动东北民团、散兵、土匪，组成抗日游击力量；聘请大学教授、熟谙外交及世界情形之人才，组成设计委员会，设计外交方面事宜；训练青年学生，组建学生军。

4. 将奉天会馆东西两院作为救国会办公地点。

大会还通过了卢广绩委托胡石如[10]起草的《告东北民众书》，为救国会成立宣言。

大会成立时选举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杜重远等27人为委员。10月21日召开全委会议时,又选举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彭小秋、霍维周、熊飞、杜重远、李梦醒等9人为常委，并组建了总务组、宣传组和军事组，由各常委分别负责。

1932年1月12日，常委会举行会议研究机构改组问题。25日，机构改组完成：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设执委41人、常委15人、监委5人；原总务组改为秘书处，由卢

广绩、高崇民负责；原宣传组改为宣传部（后改为政治部），由阎宝航、杜重远负责；原军事组改为军事部，由王化一负责。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主要开展了两方面的工作：

第一，宣传抗日，奋起救亡。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告东北民众书》中就疾声呼吁：“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中华民族已经到了“危机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因此，要“群策群力，同舟共济，以与倭奴决一雌雄。”为主持正义而战，为保障和平而战 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起见，均不得不出于最后一战！”

针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侵略妥协退让，《告东北民众书》指出：“日人占领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伎，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

1931 年 9 月 27 日，国民党因党权之争而公开对峙的宁粤双方首领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会议在表面上是以“国难当头，应加强团结”为由，实则是双方进行权力再分配的一次会议。 28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借“和平会议”召开之机，组织东北流亡同胞和各东北民众团体代表组成“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赴沪请愿，以期唤起民众，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会议推举冯庸大学校长冯庸为总指挥，王化一为副总指挥，

卢广绩、苏上达、李梦醒、高崇民、阎宝航等9人为指挥。请愿团共有628人,分编成12个分队,于11月5日由北平乘车出发。

请愿团出发前发表了《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宣言》。《宣言》除抨击国民党政府“在此国家存亡关头,喧嚣月余不闻有对外办法”外,还向社会提出“(一)和会立即成议,(二)立即完成统一政府,(三)准备对日宣战”[11]三项具体要求。

7日晨,请愿团抵达南京车站,当即散发了大量要求国民党政府“准备对日宣战”的宣传品。晚抵达上海,受到中华职业社社长黄炎培、上海市青年会总干事陈立廷等人的热烈欢迎和招待。当他们得知“和平会议”已于是日结束,并未达成有关抗日协议后,遂立即发表宣言如下:

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钧鉴 此次吾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来沪向和会诸公请愿,原抱有极热烈之愿望,冀以至诚,促进党国领袖诸公之团结,组织强有力政府,以拯救我水深火热之同胞,以恢复我光明灿烂之东北!孰知吾辈到沪之日,即代表离沪之日,团结终于未成,统一永陷绝望,内心隐痛,诚有不忍不向国人一剖陈之。

党国不幸,东北失陷,稍具血性,无不力图团结,一致对外,况党国领袖诸公!果也自暴日侵陷辽吉,而后有和议之举。吾东北民众虽惨遭田园庐墓之墟,亡省之痛,举首南中,尚存一线希冀,不意和会虽开,纠纷未已,国难纵殷,自私未消,旧帐不清,政争不已。始以国难而来,反置国难而不谈,终以分开四全大会而散,统一无望,对外无力,是视东北为化外,等民众如鹿豕,事之惨酷怨痛,孰逾於此!夫吾东北三千万民众,微论无负于党国,无负于领袖诸公,即或负之,方其在水深火热之中,睹其焦头烂额之状,亦应动恻隐之心,为拯救之举。何至熟视无睹,无动于衷!

吾人离乱之余，敢举一言以告国人：即东北亡，内地断难独存。回忆李鸿章於三十年前，即谓朝鲜亡，满洲必亡，满洲亡，中国不能幸免！今也何如，不幸李氏之言验矣！东北被占，华北动摇，长江沿岸不安，全国俱陷恐怖！窃恐享奴隶之尊号者，不止吾不幸之东北民众已也。即党国领袖诸公，亦处於不为东海烈士，必为租界寓公之惨况，纵欲悔祸团结，弃嫌救国而亦不可复得，痛乎否也？

所望党国领袖诸公，际此国家存亡之关头，立弃旧嫌，再图团结，救东北即所以救中国，救中国，即所以救己身。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力促党国领袖诸公之猛醒，一致对日，以救东北，救中国，则吾中华民族，尚堪幸存於世界，否则吾人不欲言，不忍言矣！全国同胞，其共勉之！

反对四全大会分开！

反对国民政府分立，促进和平统一！

全国民众一致对日经济绝交！

准备对日决战！[12]

9 日，请愿团兵分两路：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面见汪精卫、胡汉民，痛陈民众抗日救亡之心声，要求政府对日开战；王化一率领请愿团其他成员冒着倾盆大雨在南市区游行示威。他们高呼抗日口号，吸引了众多上海市民自动加入到游行队伍当中。10 日，请愿团由上海返抵南京。11 日晨，便列队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已躲在中央军校时，便冒雨赶到中央军校，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在下午 3 时，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出见。他看了请愿书后，敷衍说：“政府对外作战已具决心，一切计划，不便宣布”。“对外交涉，政府自有办法，人民不应过虑”。至此高崇民立刻问道：“政府是否还要东三省？我东北民众现在未出者日被屠杀，已出者将流亡为乞丐，党国领袖

诸公对此水深火热、焦头烂额之状，曾否发过恻隐之心？政府如要东三省时，十六号国联仍无效（按：国联理事会于 10 月 24 日做出决议，要求日本军队于 11 月 6 日以前撤兵），宜用何种有效方法收回失地？请主席立予答复，以释群疑。”[13]蒋介石听后则以“具体办法不便当众宣布”为由，搪塞了过去。

“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声势颇壮的南下请愿是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一次公开的抗议活动。“九一八”事变前，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把反共作为其首要任务。“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洞开国门，放狼入室，却又幻想依靠国际联盟主持“公道”来制止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外交部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致电国联哀告说：对于日本的侵略暴行“中国始终未予抵抗，应请主持公道。”[14]9 月 23 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国民书，竟然要求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国民“应以文明对野蛮，以合理态度显露无理暴行之罪恶”；“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求公理之必伸’。[15]而国际联盟理事会于 9 月 22 日通过的决议则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军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事实，荒谬地要求‘两国立即撤兵’。[16]这就是国民党政府所祈求来的“公理”！它唯一的作用就是使蒋介石国民党的误国卖国政策大白于天下。因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公开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政策，迅速对日宣战的南下请愿活动就一时间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些报刊追踪报道请愿团的活动，北平《实

报》还发表了题为《难能可贵的救国请愿》的专评，对这次南下请愿给予高度赞扬。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为大力宣传抗日救国，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派出多支宣传队，到各地群众中开展活动，同时还把每月的 18 日定为“亡省纪念日”,每年的 9月18 日，定为“亡省周年日”。每逢“亡省纪念日”和“亡省周年日”都要着力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2 年 2 月,它在北平出版了由李全林主编的《救国旬刊》，“志在阐扬中华民族精神，叙述抗日战绩，报告抗日消息，采集抗日策略，团结抗日分子。”[17]9 月，又在北平出版了由王卓然主编的《复巢》小报和《东北通讯》，及时报道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战斗消息，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的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阐述救国会的抗日救亡主张。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共存在两年，期间它为宣传抗日救亡发表了大量的宣言、通电、论文，组织了多次报告会、联谊会、亡省纪念会等活动，为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做出了贡献。

第二，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

组织军事力量进行武装抗日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确定的重要任务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浴血战斗的，有东北军旧部、警察、民团，也有民间秘密结社的大刀会、红枪会以及绿林帮伙。他们的武装抗日大都是自发的，且分布广阔。他们有群众积极支援的优点，但也有各自为战、势单力孤、互相缺少联系等缺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了能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迅速派人尽可能地同他们进行了联系。但是由于险恶环境的限制，他们对吉、黑两省的义勇军援助较少，只对其中的小部分进行过委任；对辽、热两省的义勇军援助较多，对其中的主要部分进行了委任。据统计，到 1932 年 3 月，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有 54 路（后增至 57 路），总人数达十万余人。到同年夏季，东北全境已有义勇军 50 万余人，其中近 30 万人是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并接受其领导的。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建和领导义勇军同日本侵略者作战得到了张学良的积极支持。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时，张学良得知经费缺乏，立即调拨了 14000 元。自 1932 年 2 月至年底，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引见，张学良先后接见了赵大中等几十位义勇军负责人。他听取了他们在枪械弹药和各种物资极其匮乏的艰苦环境下与日军血战的汇报后，多次将其批拨的现款、衣物、枪械弹药等“交会转办”，分发给义勇军各部。据不完全统计，经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转运给东北义勇军各部的枪械弹药和各种物资达四次之多。第一次是 1932 年 11 月间，这批物资共 20 多吨，是运给义勇军第二、三军团的。由义勇军将领李纯华带领 30 余人将其从海路运往辽东。据日伪资料记载，这批军用物资共有“山炮 4 门，重机枪 4 架，轻机枪 4 架，炮弹 2 千发，手榴弹 5000 个，小枪子弹 30 万粒，无线电 1 台，被服衣帽 2、3 千件及其他。”第二次是在同年 12 月间，这批物资是拨给热河义勇军的，计有迫击炮 2 门，炸药 50 箱，重机关枪 4 挺，马鞍 10 件，子弹 2 万粒，迫击炮弹 500 发，手榴弹

1000 个,棉大衣 1000 件,线棉背心 850 件,毛毯 100 条,是派专人护送的。第三次是在 1933 年初，是它派人从海路运到辽宁省东沟县黄土坎的，活动于庄河县的抗日军队共约装了 80 辆车和 120 个驮子的军火。第 4 次是 1933 年 7 月下旬，是它再次派人从海路运到辽宁省东沟县窟窿山的，这批军火共有“迫击炮 4 门，重机关枪 5 挺，手提式 8 支,手枪 300 支，步枪 2000 余支，子弹甚多。”[18]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除争取张学良的帮助和支持外，还通过各界资助、募捐义卖、发行“爱国奖券”等方法多渠道地为义勇军筹措经费。杜重远、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车向忱等人先后前往南京、苏州、杭州、上海等地向工商界及海外华侨募集资金。1932 年 6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了“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发行“爱国奖券’筹集抗日经费。它共发行了 6 期‘爱国奖券’和 1 期‘特种奖券”,净余款 17 万余元，成为义勇军筹措经费的重要来源。

为了提高义勇军的素质和战斗力，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逐步加强了对义勇军的领导和管理。1932 年初,它颁布了《义勇军誓词》,规定凡参加义勇军者,均须宣誓。它还制定了《义勇军税捐暂行章程》和《义勇军抚赏简章》，并在北平奉天会馆内设立了祭祀义勇军烈士的“昭义祠”。1932 年 6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召开第 19 次常委扩大会，会议决定把义勇军划分为 5 个军区，委任了各军区的总指挥，同时还详细制定了义勇军军区、路、民团的编制，加强对各路义勇军的统一领导。

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贯彻其不抵抗政策千方百计地阻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义勇军的管理和领导，致使这些规章制度无法落实，对义勇军的领导多流于形式。

1932 年 4 月 26 日,朱庆澜[19]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后援会”(5 月改名为“辽吉黑民众后援会”，简称“后援会”)。11 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后援会”达成了合力援助和领导东北义勇军的两项协议：(1)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由王化一任总指挥，专门负责对辽宁地区义勇军的领导和指挥。(2)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协助朱庆澜专主义勇军的对日作战。

1933 年 3 月，热河抗战失利，国内舆论哗然。3 月 7 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 6 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把热河抗战失利的责任完全推给了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身份代行委员长职权的张学良。张则被迫于 3 月 8 日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5 月 31 日,黄郛、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旨意与日本关东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而且还把绥东、察东、冀东划归为日军自由出入的所谓“非军事区”，为日军控制华北创造了条件。何应钦取代张学良执掌北平军分会后，对义勇军采取了严厉的取缔措施。1933 年 4 月 27 日，北平军分会颁布了《整顿河北省境内义勇军办法

四项》,将撤入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各部相继改编、遣散。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也多方限制与压迫，伺机取缔。

为了保存这个东北人民的爱国群众团体，坚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6 月 10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致蒋介石与何应钦的公开信，表明了它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不惜作出任何牺牲的坚定立场。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它则还以更残酷的迫害。6 月 17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副部长、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在北平石虎胡同遭枪杀，执委张希尧和徐靖远也相继于 7 月初被国民党特务捏造罪名抓去。7 月 14 日,王化一、阎宝航、卢广绩等人去中南海居仁堂面见何应钦，要求国民党政府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一合法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给予支持和援助。但何应钦却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不能公开活动以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为由，胁迫它停止活动。7 月 16 日,何应钦派人正式通知王化一、阎宝航、卢广绩等人：“后援会、救国会应根据协定（按：指塘沽协定）速予取消”。[20]7 月 31 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就“政府受日寇威胁，要求后援会和救国会停止活动，本会应如何对待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1）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2）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更求精练；（3）为避免磨擦，此后转入秘密行动。”[21]

至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国民党政府的压迫下停止了公开活动。尽管如此，它在中华民族抗日斗争史上却占有特殊的一页。

第一，它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建义勇军武装抗击

日寇，是在“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的险恶环境下进行的。它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公开抨击，强烈地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宣战，亲自组建、领导东北义勇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这种“对国恨家仇,椎心泣血,誓拼此生,共矢救亡”[22]的爱国主义壮举，不仅有力地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同时也有力地破除了人们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依靠国际联盟以“公理”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幻想。

第二，它所组建和领导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与日寇浴血奋战了两年，给侵略者以重创，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和扩大侵华战争的进程。据 1933 年 10 月 3 日《盛京时报》报道：在义勇军的抗击中，“关东军战死将校 99 名、准士官以下 1750 名，共计战死 1849 名；关东军负伤将校 243 名、准士官以下 4819 名，共计 5062 名。死伤合计 6910 名。”另据著名抗日将领周保中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 1933 年上半年，义勇军击毙日军达 25000 多名。当时在日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话：“马贼（义勇军）的枪一响，日本兵一个的死；马贼枪两响，日本兵两个的死。”[23]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矫正了一些国际人士的视听。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说：“满洲事实上没有被义勇军袭击的地方，竟找不出一处来”。伦敦《每日导报》也撰文说：义勇军“更迫使满洲国当局日陷不宁，日下满洲境内，日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马路。”[24]

第三，它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最早成立的有广泛影响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是我国第一个广泛吸收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参加的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群众团体。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以东北人士为主体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但其成员中既有国民党党员、国民党改组派成员、青年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反帝大同盟盟员和无党派人士。这些人虽然政治理想有别，党派立场不同，但在国破家亡之际，能够云集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之下，为了民族大业而团结战斗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先锋。例如，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常委兼政治部部长霍维周，是中国青年党在东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但他因抗日立场坚定，在东北青年学生中有较大影响。1935 年 7 月 25 日英勇就义的抗日英雄苗可秀，就是在他的影响下于 1931 年底加入中国青年党的。霍维周加入救国会后抛弃党派成见，以抗日救亡为最高行动准则。他提出：“今日惟有抗日是我们的神圣职责。为抗日而救国，是谓忠；为抗日而辞亲，是谓孝；抵抗到底而不屈服，是谓节；牺牲个人而挽救同胞，是谓义。我们抗日的力量要集中，抗日的行动要有组织，抗日的精神要团结。凡我东北同胞，都应当集中于抗日旗帜之下”。[25]他在救国会中言必信，行必果，一直为抗日救亡战斗到最后一息。正是爱国主义这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26]使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同仁们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这也是它能够广泛吸收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内在动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